

“中日书籍之路”国际 学术研讨会缘起

2000 年 9 月 18 日，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日书籍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议由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王勇教授主持，日本皇学馆大学校长大庭修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严绍璁教授、日本明治大学德田武教授分别作了精彩的学术讲演。讲演会之后，举行了学术讨论会，来自各地的专家、教授及浙江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聚集一堂，围绕中日书籍交流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书籍之路”(Book Road)的概念由王勇教授近年提出，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98 年王勇教授赴日讲学期间，先后应邀在和汉比较文学会、早稻田大学国文学会、早稻田大学史学会作“古代中日的书籍之路”、“中世中日的书籍之路”、“近世中日的书籍之路”的学术讲演，覆盖日本全国的 KBS 卫星电视(1999 年 7 月 8 日)播出王勇教授的专访片。国内的《光明日报》(1999 年 8 月 10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 年 8 月 6 日)《浙江日报》(1998 年 8 月 5 日)《中国文化报》(1997 年 10 月 21 日)等分别做过专访或报道。

“书籍之路”概念的提出，意在论证古代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无论内容、形式，还是意义、影响，均有别于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Silk Road)。简而言之，中国与西域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丝绸”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层面；而中国与日本的交流，则主要体现在以“书籍”为媒介的精神文明层面。前者虽

然能暂时地、表面地、局部地装点某个地区的文明景观，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的文明内质；后者则可以积淀在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该民族创造文明的源泉。

1999年王勇教授牵头的国际合作项目“书籍之路与东亚文明”获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2000年王勇教授应日本文部省国文学研究资料馆邀请，主持“书籍之路的构架与机制”课题，组织中日学者对“书籍之路”进行系统研究，成果汇成专著《奈良·平安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以“书籍之路”为视野》，2001年9月由日本农文协出版社刊行。

本期特辑所载的论文，是上述国际合作研究的部分成果。

（编辑部）

淡海三船与东亚的书籍之路

王 勇

日本奈良时代（710—784），朝野深受唐风熏染，吟诗属文遂成时尚，贵族文士竞趋汉学，其中淡海三船与石上宅嗣并称“文人之首”，^①独步文坛而名扬海外。淡海三船因著有鉴真传记《唐大和上东征传》而闻名遐迩，然而有关他与唐朝及新罗僧俗的诗文书籍交谊，却未必广为人知。

现存淡海三船的传记资料，主要有以下两种：《延历僧录》卷五的《淡海居士传》；《续日本纪》卷第三十八的《卒传》。前者是渡日唐人思托撰著的僧传，成书于延历七年（788）；后者系日本正史《六国史》之一，竣工于延历十六年（797）。

一、《续日本纪》的《卒传》

淡海三船（722—785），姓淡海，名三船（或作“御船”），俗称三船王（或“御船王”），多自署淡三船；出家改名元开，后奉敕还俗，赐姓真人。其父池边王，系大友皇子孙、葛野王子，具有天智天皇一族的血统。延历四年（785）七月十七日，在“刑部卿从四位下兼因幡守”任上去世，享年64岁。《续日本纪》卷第三十八载《卒传》云：

刑部卿从四位下兼因幡守淡海真人三船卒。三船，大友亲王之曾孙也。祖葛野王正四位上式部卿，父池边王从五位

上内匠头。三船，性聪敏，涉览群书，尤好笔札。宝字元年，赐姓淡海真人，起家拜式部少丞。累迁，宝字中，授从五位下，历式部少辅、参河·美作守。八年，被充造池使，往近江国修造陂池。时，惠美仲麻吕道自宇治，走据近江，先遣使者，调发兵马。三船在势多，与使判官佐伯宿祢三野共捉缚贼使及同恶之徒。寻将军 早部宿祢子麻吕、佐伯宿祢伊达等，率数百骑而至，烧断势多桥。以故贼不得渡江，奔高岛郡。以功授正五位上勋三等，除近江介。迁中务大辅兼侍从，寻补东山道巡察使，出而采访，事毕复奏，升降不愆，颇乖朝旨。有敕谴责之，出为大宰少式，迁刑部大辅，历大判事、大学头兼文章博士。宝龟末，授从四位下，拜刑部卿兼因幡守。卒时年六十四。

这篇传记概述其一生，但有些地方欠详甚至有误。兹从《续日本纪》中捭拾相关史料，并参照其他相关史书，将淡海三船的主要赐姓、任官等记事，按照年代排序如下（依据其他文献者，在文末注明出处）：

天平胜宝三年（751）奉敕还俗，赐姓真人，起拜式部少丞

天平胜宝八年（756）五月遭卫士府禁锢，时任内竖（内舍人）

天平宝字二年（758）八月任尾张介。（《大日本古文书》十五）

天平宝字四年（760）正月任山阴道巡察使，时正六位上。

天平宝字五年（761）正月迁参河守，时从五位下。

天平宝字六年（762）正月补文部（式部）少辅。

天平宝字八年（764）八月任美作守，旋充造池使赴近江。九月，授正五位上勋三等，除近江介，迁中务大辅兼侍从。

天平神护二年（766）九月出为东山道巡察使。

神护景云元年（767）三月任兵部大辅。八月贬大宰大貳。

宝龟二年（771）七月迁刑部大辅。

宝龟三年（772）四月任大学头兼文章博士。

宝龟八年（777）正月转大判事。

宝龟九年（778）二月复任大学头。

宝龟十一年（780）二月叙从四位下。

天应元年（781）十月再任大学头。十二月光仁天皇驾崩，任御装束司。

延历元年（782）八月兼因幡守。

延历三年（784）四月升刑部卿。

通观淡海三船一生的仕途，既不乏机遇，又时遭挫折。可谓几番沉浮，命运多舛。以学者而论，大学头、文章博士已臻巅峰；就仕途来说，从四位下、因幡守非属一流。

我们先看挫折。第一次是天平胜宝八年（756）遭卫土府禁錮，《续日本纪》把原因归咎于“诽谤朝廷，无人臣之礼”，可见淡海三船不是阿谀奉承之辈，当是性情刚直之士。第二次是神护景云元年（767）贬为大宰大貳，《续日本纪》说他因“独断”而被革去巡察使之职，或许说明他毕竟还是书生，不善处理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

接着再看机遇。首先是天平胜宝三年（751）的赐姓，《续日本纪》同年正月二十七日条云：“赐无位御船王姓淡海真人。”淡海三船为何从“无位”而获赐姓封官？正史没有明言，其实时逢佳机，这个问题放在下节探讨。其次是天平宝字八年（764）授正五位上勋三等，这是因为同年（764）惠美押胜发动兵变，淡海三船平叛有功，遂得授勋晋位，并迁中务大辅兼侍从，成为天皇身边的亲信。

淡海三船能在跌倒后东山再起，与他杰出的文才有关。《续日本纪》天应元年（781）六月二十四日条云：“自宝字后，宅嗣及淡海真人三船为文人之首。”从天平宝字二年（758）到天

平宝字九年（765），淡海三船的官位累年迁升，正与“文人之首”之声名日盛相符，加上平叛惠美押胜兵变立下军功，因此贬为大宰大貳不过数年，一跃升为大学头兼文章博士，成为奈良学坛的最高权威。

正史的淡海三船传记，偏重其仕途沉浮，而与官场无涉的事迹大多略而不述。因此，仅凭《续日本纪》的相关记录，无法窥视淡海三船之全貌。值得庆幸的是，随鉴真东渡的唐僧思托所撰的《延历僧录》中，存有《淡海居士传》一篇，包含许多正史未载的珍贵史料，如师从唐僧道璇、鉴真学习佛教，与唐人祐觉、丘丹隔海唱和等等，使我们可将淡海三船作为古代东亚的一位杰出文化人士进行探讨成为可能。

二、《日本高僧传要文抄》 引录《淡海居士传》

天台僧思托是鉴真的弟子，天平胜宝五年（753）随师渡日，延历七年（788）著《延历僧录》，是为日本僧传之嚆矢。此书早已失传，逸文散见诸书，据近年后藤昭雄教授发现的《龙论钞》所引逸文，可知原书厘为5卷，共载142人传记，其中以下32人的传记有逸文可考。^②

第一卷：鉴真、道璇、思托、荣睿、普照、隆尊（共7人，今存6人）；

第二卷：圣德太子、天智天皇、圣武天皇、光明皇后、桓武天皇、乙牟漏皇后、文屋净三（共10人，今存7人）；

第三卷：（共23人，包括仁干、智光、光仁等，传记无存）；

第四卷：（共58人，包括贤璟、平备、行表等，传记无存）；

第五卷：（沙门）庆俊、戒明、明一、神睿、慈训、弘耀、惠忠；（居士）藤原良继、藤原不比等、藤原继绳、藤原鱼名、藤原种继、石上宅嗣、佐伯今毛人、石川恒守、淡海三船、中臣镰子、大中臣诸鱼、穗积加古（共沙门 14 人、居士 30 人，今存沙门 7 人、居士 12 人）。

《延历僧录》虽名“僧传”，其实立传不限于僧侣，涉及帝王、皇后、官吏、居士等，可以看作是一部奈良时代文化人士的传记总集。此书还因为保留许多珍贵的史料，包括渡日唐人的传记，可补中日史书之不足。

建长元年（1249），东大寺尊胜院主宗性，广泛搜罗历代僧传加以抄录，3 年而成《日本高僧传要文抄》3 卷，卷三抄录的《延历僧录》中，包括《淡海居士传》的佚文，兹录如次：

淡海居士淡海三船传

又云：淡海居士淡海真人三船，曰元开，近江天皇之后。锡得天枝，流海源别，赐真人姓。童年厌俗，忻尚玄明。于天平年，伏膺唐道璇大德，为息恶。探阅三藏，披检九经。真俗兼该，名言两泯。胜宝年，有敕令还俗，赐姓真人。赴唐学生，因疾制亭。虽处居家，不着三界。示有眷属，常修梵行。求会真际，故奉太微之圆觉。顺时俗，故奉法宾王。文

此言“近江天皇之后”，与《续日本纪》“大友亲王之曾孙”呼应。大友亲王之父即天智天皇，亦称“淡海帝”或“近江天皇”，^③“锡得天枝，流海源别”，是说淡海三船出自天皇枝裔，似与近江天皇之谥号“天命开别”有关；“真人”之姓列《八色之姓》冠首，始定于天武十三年（684）十月，仅授予皇室氏族。

自“童年厌俗”以下，有两则重要史实：一是“伏膺唐道璇大德”，二是“赴唐学生”。前者是说淡海三船曾随唐僧出家，

后者是说淡海三船一度入选遣唐使成员，两则史事《续日本纪》皆漏载。

关于淡海三船出家的时期，《延历僧录》仅言“天平年（729—748）”。然据吉备真备撰《道璇和上传纂》^④“大唐道璇和上，天平八岁至自大唐”，则“伏膺唐道璇大德”必在天平八年（736）之后。淡海三船出家之后“为息恶”，所谓“息恶”即“沙弥”的别称。按照奈良时代的僧尼令，20岁之前出家而未受具足戒，从师僧杂役修行者称“沙弥”。参酌“童年厌俗，忻尚玄明”一句，淡海三船出家当在15—20岁之间。其后“探阅三藏，披检九经。真俗兼该，名言两泯”，在唐僧道璇的亲炙之下，研读佛典儒经，成为兼通内外的博学之士。

关于“赐姓真人”的时期，《续日本纪》有“天平胜宝三年（751）”与“天平宝字元年（757）”两说，然参酌《延历僧录》“胜宝年有敕，令还俗赐姓真人”的记载，当以“天平胜宝三年”为是。年届30岁而尚无位的淡海三船，为何在天平胜宝三年突然被“敕令还俗”呢？《续日本纪》没有涉及个中原因，从《延历僧录》始知是因为入选了“唐学生”。

查《续日本纪》，天平胜宝二年（750）九月二十四日，任命藤原清河为遣唐大使、大伴古麻吕为副使并判官、主典（录事）各4人；天平胜宝三年（751）二月十七日，“遣唐使杂色人一百一十三人”叙位有差；同年四月四日，朝廷“为令遣唐使等平安”派专使参拜伊势神宫等；同年十一月七日，追加任命吉备真备为副使；天平胜宝四年（752）三月三日，遣唐使一行拜朝，九日接受节刀，尔后扬帆出发。

朝廷在任命遣唐使的四等官员（大使、副使、判官、录事）之后，开始选拔各类专门人才，天平胜宝三年（751）正月二十七日敕令淡海三船还俗并赐姓，显然是这项工作中的一环。二月十七日随从人员113人“叙位有差”，说明选拔工作基本完成。

淡海三船为这次出使唐朝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原拟将日本历代的汉诗及自己的诗文著作带往中国请益，惜乎“因疾制亭”未能成行。此后，淡海三船虽然还俗，但依然心仪佛教，同时“奉法宾王”步入仕途。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日本高僧传要文抄》辑录的《淡海居士传》已是完篇，叹息淡海三船如果入唐的话，必会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佳话。其实，淡海三船虽然终生未得入唐，但确实与唐朝僧俗结下很深的诗文交谊。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说，是因为后藤昭雄教授发现了失传已久的《淡海居士传》的完篇。

三、《龙论钞》引录《淡海居士传》

大阪府河内长野市有一座真言宗的古刹金刚寺，大阪大学后藤昭雄教授在调查该寺藏书时，发现寺僧禅惠于正和四年（1315）抄写的《龙论钞》1册，书中引录的《淡海居士传》，比已知的《淡海居士传》多出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亦即，《日本高僧传要文抄》仅辑录了传记的开首部分，有关淡海三船与唐人鉴真、祐觉、丘丹进行诗文交谊的重要内容，仅见于《龙论钞》所引的《淡海居士传》中。

《龙论钞》引录的《淡海居士传》，内题“淡海居士传刑部卿”，开首部分基本与《日本高僧传要文抄》相同，但也有个别字辞不同，如“忻尚玄明”作“忻尚玄门”，“赴唐学生”作“起唐学生”；“因疾制亭”作“因患制亭”等。《日本高僧传要文抄》的传记终于“顺时俗，故奉法宾王”，《龙论钞》的传记则有如下续文。

后真和上来，上诗云五言

摩腾游汉国，僧会入吴宫。

岂若真和上，含章渡海东。

禅林戒网密，慧苑觉花丰。

欲识玄津路，缁门得妙工。

便伏膺为斋戒弟子，既蒙赐。或云，自庆诗一首五言

我是无明客，长患有漏津。

今朝蒙善诱，怀抱绝埃尘。

道种将萌夏，空花更落春。

自归三宝德，谁畏六魔瞋。

于政事暇，礼佛读经。每于节会，花香奉佛。兼述真和上《东征传》一卷，俞扬威用先。后又注《起信论》，□藻钩玄门。东大寺唐学僧圆觉，将《注论》至唐。唐灵越龙兴寺僧祐觉，见《论》手不释卷。因回使，有赞诗曰五言

真人传起论，俗士著词林。

片言复析玉，一句重千金。

翰墨舒霞卷，文花得意深。

幸因星使便，聊申眷仰心。

居士又作《北山赋》，至长安。大理评事丘丹见赋，再三叹仰：“曹子建之久事风云，失色不奇。日本亦有曹植耶。”自还使，便书兼诗曰五言

儒林称祭酒，文籍号先生。

不谓辽东士，还成俗下名。

十年当甘物，四海本同声。

绝域不相识，因答达此情。

无量寿国者，风生珠，禁聪苦空，水激全流，波挨常示。居士摄心念诵，愿生安乐云云。

出《延历注录》第五卷

这部分的传记，主要包含以下4项内容：与鉴真的关系；与祐觉的关系；与丘丹的关系；临终描述。

先看与鉴真的关系。淡海三船所撰的《唐大和上东征传》

卷末，录有《初谒大和尚二首并序》，似乎二首诗均是初谒鉴真时进献的作品。《淡海居士传》未录诗序，所载诗歌亦与《唐大和上东征传》文字略有出入。尤为重要的是，《淡海居士传》廓清了二诗创作的背景。亦即，“摩腾游汉国”云云是初谒鉴真时的进呈之作，“我是无明客”云云是服膺鉴真后的自庆诗。从这篇传记可知，淡海三船先师从道璇，继服膺鉴真，与赴日唐僧关系密迩。

次看与祐觉的关系。《唐大和上东征传》成书于宝龟十年（779）二月，淡海三船注《大乘起信论》当在此后。此书由东大寺僧圆觉送往唐朝，且唐人赋诗回赠作者，表明事在淡海三船生前。从宝龟十年（779）至淡海三船去世的延历四年（785），日本仅派出过一次遣唐使，即宝龟十年（779）五月二十七日出发的送唐客使布势清直一行，圆觉似乎作为“唐学僧”随此次使团入唐。遣唐使走的是南路，先在明州一带登陆，圆觉将《大乘起信论注》赠给越州龙兴寺僧祐觉，祐觉“见《论》手不释卷”，因作赞诗回赠作者。这首堪称中日文化交流见证的五言律诗，不惟《全唐诗》未载，近年出版的一些专门辑录中日唱和诗的著作亦都漏收^⑤，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唐代佚诗。

再看与丘丹的关系。淡海三船托圆觉将佛学著作《大乘起信论注》带往中国的同时，又作《北山赋》托人送至长安，大理评事丘丹读后赞叹：“曹子建之久事风云，失色不奇。日本亦有曹植耶？”遂将书信及赞诗托遣唐使带给作者。丘丹的书信今不存，赞诗则因《淡海居士传》而保存下来。这首五言律诗亦不为《全唐诗》等辑录，与祐觉的赞诗具有同等的价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州龙兴寺僧祐觉生平不详，而“大理评事丘丹”则是名声不算太小的唐代诗人。《全唐诗》卷307载有小传：

丘丹，苏州嘉兴人，诸暨令，历尚书郎，隐临平山。与

韦应物、鲍防、吕谓诸牧守往还。存诗十一首。

《全唐诗》卷 883 也录其诗 2 首，这样存诗共 13 首；此外，卷 789 另有两首诗辑其联句。丘丹新旧《唐书》无传，生卒年不详。从《全唐诗》所收作品来看，与韦应物、崔峒等名流过往甚密，据《经湛长史草堂》诗序的署款，知贞元六年（790）的头衔是“检校尚书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其他事迹则多不考。今据《淡海居士传》，可以确认布势清直一行入唐期间（779—781），丘丹担任大理评事（从八品下），在长安与遣唐使有过交往，并与淡海三船隔海唱和，谱写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最后是临终描述。思托的《延历僧录》成书于延历七年（788），距淡海三船去世（785）不过 3 年。“居士摄心念诵，愿生安乐”云云，说明淡海三船直至晚年信佛不怠，并与思托等唐僧保持往来。

四、《释摩诃衍论》伪书风波

后藤昭雄教授新发现的《淡海居士传》，不仅使淡海三船作为“文人之首”的形象跃然纸面，而且为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证史料。然而，《龙论钞》引录《淡海居士传》，多少有些偶然因素在内。

所谓《龙论钞》，是龙树撰、筏提摩多译《释摩诃衍论》的略称，《释摩诃衍论》则是马鸣著、真谛译《大乘起信论》的注释书。这部《释摩诃衍论》，最早由入唐僧戒明带回日本。淡海三船一读之下，发现诸多疑点，当即判为伪书，致书戒明说“愿早藏匿，不可流转，取笑于万代”，在日本引发一场真伪之争的风波。

《龙论钞》便是在这场风波中诞生的一部著作，书中引载

《释摩诃衍论》的本文，又从各书中抄录真伪两说的“证文”，其中包括淡海三船的《送戒和尚状》；因为淡海三船所著的《大乘起信论注》也与此有关，所以从《延历僧录》中引录了《淡海居士传》全文。

淡海三船的《送戒和尚状》今存于《宝册钞》（八）《唯识论同学钞》（二之四）《龙论钞》中除了个别文字有些出入外，三书所传内容相同。兹据《宝册钞》（八）引录全文（个别文字作了校订，原文双行夹注改为括号标注）：

三船真人送戒明和尚状云

《释摩诃衍论》十卷（马鸣菩萨本论龙树菩萨释论）

一昨使至，垂示从唐新来《释摩诃衍论》。闻名之初，喜见龙树之妙译；开卷之后，恨秽马鸣之真宗。今检此论，实非龙树之旨，是愚人假菩萨高名而所作耳。但其本论者，实马鸣菩萨之《起信论》也。梁承圣三年甲戌，真谛三藏之所译也。

今其伪释序云：“迴天凤威姚兴皇帝制，弘始三年岁次星纪庚子于大庄严寺，筏提摩多三藏译也。”《晋书》云：“后秦姚兴，生称大秦皇帝，死称天桓皇帝”始终无“迴天凤威”之号。又姚者姓也，兴者名也，取皇帝姓名即为名，未之有也。又自弘始三年至承圣三年，相去一百五十五年。取后译之本论，合前译之释论，同为一人译，是大虚妄也。又检本论，文雅义圆；今此伪释，文鄙义昏。同卷异笔，必非同译，理则明矣。

今大德当代智者，何劳远路，持此伪文来？昔膳大丘，从唐持来金刚藏菩萨注《金刚般若经》，亦同此论，并伪妄作也。愿早藏匿，不可流转，取笑于万代。真人三船白。

宝龟十年闰五月二十四日状

戒明阁梨座下

已上

在这封书状中，淡海三船提出 4 个疑点，据此把《释摩诃衍论》断为伪书。

首先是“迴天凤威”之号，淡海三船征引《晋书》，指出姚兴皇帝无此名号。流布本《大正新修大藏经》《释摩诃衍论》有“天册凤威姚兴皇帝制”序，《宝册钞》（八）云：“迴天凤威者，自元非皇帝讳，是叹帝德之言也。”颇得要领。事实上，80 卷本《华严经》有“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制”序，《武周录》亦有“我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陛下”序，皆属同类，不足为奇。

其次是直呼“姚兴”，淡海三船认为“取皇帝姓名即为名，未之有也”。记名之方法，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虽不失为判断古籍真伪时应加以考虑的因素之一，却不能视为绝对的标准。如《大唐国衡州衡山道场释思禅师七代记》所引的碑文，尾署“李三郎帝即位开元六年岁次戊午二月十五日”，甚至连玄宗的乳名有时也会公开登场。^⑥

再则是本论与注疏汉译的时间次序。《大乘起信论》成于承圣三年（554），而《释摩诃衍论》成于弘始三年（401），所以淡海三船会说注疏反比本论早 155 年（实为 153 年），“是大虚妄也”。《宝册钞》（八）驳斥道：“于释论者弘始三年虽译之，《起信》梵本重请来之日依为同本，真谛三藏承圣三年写先译《释摩诃衍论》中本论文言奉上，有何过乎？”意思是说，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时，参考了 153 年前筏提摩多翻译的《释摩诃衍论》将书中引用的本论《大乘起信论》采入译著。这种情况不能说完全没有，如玄奘翻译的经疏，当本经此后传入中国时，译者有时直接抄录玄奘译经中的引文。^⑦

最后是本论与释论文风不同，淡海三船评述本论“文雅圆”而释论“文鄙义昏”，断言“同卷异笔，必非同译”。这个

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倘若按照前面的推测，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时抄录了《释摩诃衍论》的本论译文，那么《释摩诃衍论》必出自筏提摩多一人手笔，书中不应该出现“文雅义圆”与“文鄙义昏”的现象。对此，《宝册钞》（八）举真谛所译《玄文论》，文风与《大乘起信论》迥异，指出：“本论马鸣所造，末论龙树所造也。梵本文章各别，故汉本随不同也。”译文如要保持原著风格，在翻译不同著作时变换文风，也在情理之中。

以上列举并分析了淡海三船提出的疑点，这些疑点虽然不能全部作为“伪书”的证据，但至少说明淡海三船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⑧《送戒和尚状》最后建议戒明“愿早藏匿，不可流转，取笑于万代”，署“宝龟十年（779）闰五月二十匹日”，淡海三船时任大学头兼文章博士，是众望所归的学术界领袖。至于敢几天之内速断《释摩诃衍论》为伪书，则与他刚刚撰完《大乘起信论注》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会涉及。

五、《怀风藻》成书经纬

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究竟由谁编撰而成？至今仍然是个不解之谜。这部诗集现存作者 64 人，作品计 116 首，另有诗人传记 9 篇。卷首冠有长序，兹引述如下：

逖听前修，遐观载籍：袭山降辔之世，檀原建邦之时，天造草创，人文未作。至于神后征坎、品帝乘乾，百济入朝，启龙编于马廐；高丽上表，图乌册于鸟文。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教于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逮乎圣德太子，设爵分官，肇制礼义。然而专崇释教，未遑篇章。

及至淡海先帝之受命也，恢开帝业弘阐皇猷；道格乾

坤，功光宇宙。既而以为：调风化俗，莫尚于文；润德光身，孰先于学。爰则建庠序，征茂才，定五礼，兴百度。宪章法则，规模弘远；夙古以来，未之有也。于是三阶平焕，四海殷昌；旒纛无为，岩廊多暇。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翰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唯百篇。但时经乱离，悉从煨烬；言念湮灭，轸悼伤怀。

自兹以降，词人间出。龙潜王子，翔云鹤于风笔；凤翥天皇，泛月舟于雾渚。神纳言之悲白鬓，藤太政之咏玄造，腾茂实于前朝，飞英声于后代。

余以薄官余闲，游心文囿。阅古人之遗迹，想风月之旧游，虽音尘眇焉，而余翰斯在。抚芳题而遥忆，不觉泪之泫然；攀缙藻而遐寻，惜风声之空坠。遂乃收鲁壁之余蠹，综秦灰之逸文。远自淡海，云暨平都，凡一百二十篇，勒成一卷。作者六十四人，具题姓名，并显爵里，冠于篇首。

余撰此文意者，为将不忘先哲遗风，故以怀风名之云尔。于时天平胜宝三年岁在辛卯冬十一月也。

江户时代硕儒林春斋，将编者比定为淡海三船；此后尾崎雅嘉、伴蒿蹊、伴信友、上田秋成、藤井贞干、柿村重松、福井康顺、横田健一等著名学者，均起而响应，陆续提出一些有力的证据。

如从修辞特点分析，正史及《万叶集》多用“近江”，而《怀风藻》及淡海三船的其他作品均用“淡海”；《怀风藻》（序）中有“腾茂实于前朝，飞英声于后代”之句，与《扈从圣德宫寺》五言诗中的“茂实流千载，英声畅九垓”如出一辙；《怀风藻》及《大安寺碑文》均用“龙潜”之语，而《古事记》等仅用“潜龙”；《怀风藻》（道慈传）云“妙通三藏之玄宗，广谈五明之微旨”，《大安寺碑文》评道慈“学完五明，智洞三藏”，而《续日本纪》（《道慈卒传》）没有类似的词句。柿村重

松据此推测,《怀风藻》必与《大安寺碑文》、《扈从圣德宫寺》同出一人之手,断定作者是淡海三船。^⑨

近年,藏中进教授通过分析前述序言,认为《怀风藻》之编纂,是因为淡海三船入选“唐学生”后,有意将历代汉诗结集携带入唐,所以才急“收鲁壁之余蠹,综秦灰之逸文”;此后“因疾制亭”,在遣唐使出发后的忧闷岁月中,“略以时代相次,不以尊卑等级”(《怀风藻》目录)排序作品,补上诗人传记9篇,另撰序文1篇,成为现在的体裁。^⑩

编书集册以求证中华名士,实是奈良时代以来日本高僧、硕儒之心态,试举数例如下:与淡海三船并称“文人之首”的石上宅嗣,著《三藏赞颂》托人送至唐内道场;最澄搜集《屈十大德疏》、《本国大德诤论》入唐后施入天台山;五代时宽建入华,上奏请赐菅原道真等名家诗集;源信为送宋而修改《往生要集》;“欲令知异域之有此心”,^⑪皆可作为佐证。

编撰《怀风藻》这样的诗集,既需要具备出众的才华,又必须有合理的动机,8世纪中叶二者兼具之文人,大概屈指可数。藏中进教授从结集送唐的角度,推定编者是淡海三船,确实有独到之处。不过,认为《怀风藻》在遣唐使出发后的“忧闷岁月”中编撰而成,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疏忽。《怀风藻》的序文写于天平胜宝三年(751)十一月,遣唐使则是天平胜宝四年(752)三四月间才出发的,倘若淡海三船为了携带入唐而编撰诗集,心情必然处于亢奋状态,决不会在“忧闷岁月”中苦熬。

既然《怀风藻》在遣唐使出发之前已经编撰完毕,那么“因疾制亭”的淡海三船是否托人带入中国了呢?《淡海居士传》提到圆觉将其《大乘起信论注》转呈唐僧祐觉,如果《怀风藻》确系淡海三船所编,便有可能同时传入中国。我们再来看看祐觉的赠诗:

真人传起论,俗士著词林。